

# 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剖析海外华人的安全形势

## ——基于欧洲华人社群的经验数据

李武智, Gilles Guiheux

(巴黎西岱大学 亚非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 巴黎 75013)

**摘要:** 文章参考西方学术界关于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相关理论, 结合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欧洲华人社群的经验数据, 剖析这一群体所处的文化安全处境, 探索文化安全对其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和身份认同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 西方社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主义印象与对移民群体的种族主义偏见有着紧密联系, 这使得欧洲华人群体的文化安全形势复杂且脆弱。保护海外华人个体的文化安全与保卫我国整体的文化安全密不可分, 海外华人所处的文化安全形势对理解我国面临的整体文化安全挑战至关重要。

**关键词:** 文化安全; 东方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 种族主义; 移民; 海外华人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4-0120-11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4.013

###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Europe

Li Wuzhi, Gilles Guiheux

(Institute of Asian-African-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é Paris Cité, Paris 75013, France)

**Abstract:** Referring to relevant theories respecting Orientalism and racism in western academia, this study combines empirical data on different occupational and age group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Europe to probe into the cultur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ultural security on their economic, personal, and identity security. It has found that the impression on Orientalism in western societies, including China,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racial prejudices towards immigrant groups, which makes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Europe complex and delicate.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security of individual overseas Chinese is inseparable from defending the overall cultural secur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ir cultural security situation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overall cultural security challenges facing our country.

**Keywords:** cultural security; Orientalism; cultural imperialism; racism; immigration; overseas Chinese

##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影响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 相互交织。目前, 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 最直接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

收稿日期: 2023-03-27

作者简介: 李武智(1995—),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种族主义、移民经济与移民融入;

Gilles Guiheux(1966—), 男, 教授, 主要从事移民经济、中国经济社会学、劳工研究。

对抗,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各民族和国家纷纷参与到了“软实力”(soft power)竞争中<sup>[1](P4)</sup>。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在国家内部被充分地传播和认同,在国际社会被正确地解读和尊重,是该民族和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表现。对身居海外、作为移民少数群体的个人而言,文化安全是其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受到保护<sup>[2]</sup>,并免于因以上文化要素的污名化而造成现实意义上和符号意义上的侵害。文化是个人身份认同的“安全网”,是个人整体“人类安全”的一个重要要素<sup>[1](P5)</sup>,对于移民群体在迁入国的生存和融入至关重要。

本文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海外华人的个人文化安全为例,从国家和个体两个角度,分析二者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形势。一是结合“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概念,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如何在文化层面将被殖民民族和国家低等化和“他者”化,并最终将自己的统治合理化。同时,展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如何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继续巩固其霸权。二是解析种族主义在西方社会内部的运行机理,揭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将社会成员通过族裔这一标准分为“少数”(minorité)和“多数”(majorité),并将对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和刻板印象作为标签强加给少数族裔群体,简化他们的形象,从而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他者”。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与外国文明和少数移民群体有关的文化元素的曲解和污名化,使少数族群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三是结合有关欧洲华人社群的经验数据,揭示欧洲华人的文化安全现状,以及这种文化安全的缺失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安全、人身安全和身份认同安全的威胁。四是探讨

国家文化安全和个体文化安全的关系,并尝试为确保新时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以及海外华人个人文化安全寻找方案。

## 二、东方主义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美国后殖民主义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的奠基者之一爱德华·W.萨义德曾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相互较量的舞台。它完全不是那种阿波罗式的彬彬有礼的平和国度,文化甚至是一片战场,各种力量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彼此相互争夺。”<sup>[3](P14)</sup>萨义德指出了文化和统治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帝国主义利用文化在塑造人的意识形态过程中的排他性,将文化作为一种支配手段,而“东方主义”则是贯穿这种帝国主义文化支配的核心概念。

通过对大量西方关于中东地区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的研究,萨义德发现,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曾经殖民统治过地中海地区的老牌殖民帝国,有着漫长的“东方主义”传统。他指出,“‘东方’不仅毗邻欧洲,也是欧洲最重要、最富饶、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其文明和语言的来源。东方是欧洲的文化竞争者,是欧洲眼中最根深蒂固的、最常反复出现的他者的形象。除此之外,东方还凭借其截然不同的形象、观念、人格和经历定义了什么是欧洲(或者西方)。”<sup>[4](P1)</sup>由于“东方”是西方在二元对立的逻辑下为了完成自我定义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所以,将与自身截然相反的特性赋予东方,以便形成本体论和认知论上的区别,就成了西方国家自然而然的行为,因此,“他者性”(altérité)就成为了“东方”最基本的属性。

在完成了“他者”和“自我”的构建之后,还需要在两者之间确立一种关系。例如,以英法

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国家在对众多非西方国家实现了殖民统治之后,就需要将“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设置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并将其合理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剥夺这个被支配的“他者”的主体性,使其变成一个不再具有“话语”(discourse)和“历史性”(historicité)的非主体。因此,东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论证这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方法体系,即“东方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处理‘东方’的制度被讨论和分析,通过对它(东方)发表陈述、允许形成关于它的观点、描述它、教授它、设定它以及统治它(完成对东方的处理)。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支配、重构东方以及对其施加权威的方式”<sup>[4](P3)</sup>。

主体性的丧失意味着文化定义权被对方掌握,文化主体的各种文化特征都有被污名化的风险,如此,文化安全则无从谈起。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主体可以反复强调被支配主体的落后性,从而确立自身的优越性,进而实现自己的文化霸权(hégémonie culturelle)。拥有文化霸权的一方对于丧失文化自主权一方的侵略可以被描述为“将文明带给原始人或者野蛮人”,“‘他们’不像‘我们’,因此他们就应该被统治”<sup>[3](P12)</sup>。至此,帝国主义通过在自己的社会和被统治国家的社会灌输这种东方主义思想,通过掌握“叙事的权力,或者阻止其他的叙事产生”<sup>[3](P13)</sup>,完成了稳固其统治地位的最后一步——实现全面的文化支配。

失去文化主权的民族和国家,他们的文明会被低等化、污名化和“他者”化,成为“他者叙事”中的一个形象,丧失主体性和历史性。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和宣传机器依然源源不断地按照自己的统治需要生产文化内容,而这些帝国主义强加给被殖民民族和国家的“东方主义”化的形象还会被后者内化,成为他们评判自己以及评判其他非西方民族的

标准。

如果说东方主义源于西方通过想象“他者”塑造自我集体认同的需要,以及统治远方的土地和民众的需求,那么种族主义则是其社会内部某些社会关系的体现,它依然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只不过此处的“他者”不再是远方充满异国情调的人们,而是一群生活在自己周边、但看起来却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因此常常被定义为这个社会的少数者和边缘者。如同所有的社会关系一样,这种关系也是依据某种特定的社会现实构建起来的。马克思指出,“人类在生产符合物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也生产观念和分类,也就是关于这些社会现实的抽象理念表达。因此,这些分类及其表达的社会关系一样是难以持久的。它们是历史与过度的产物。”<sup>[5]</sup>“分类”(catégorisation)是种族主义运作的基础,因为只有按照一定的标准把社会分为“多数群体”(les majoritaires)和“少数群体”(les minoritaires),才能够确定谁是“自我”,谁是“他者”,并且加以区别对待。

法国社会学家科莱特·吉约曼(Colette Guillaumin)在其著作《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起源与当下用语》(*L'idéologie raciste. Genèse et langage actuel*)中,从谁“命名”(nommer)和谁“被命名”(être nommé),或者谁“指认”(indiquer)和谁“被指认”(être indiqué)的角度来剖析“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分类<sup>[6](P213)</sup>,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社会分类中的多数群体不会自我定义,他们通过语言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强加给别人。“少数群体处在一个与社会主体相反的位置。他们从主流社会中被分割开并被视为陌生人。社会参考标准与他们之间的隔阂是绝对的,他们是这个定义了他们的社会主体的异质存在(hétérogénéité)。”<sup>[6](P218)</sup>多数群体是以自身为参照标准定义少数群体,所以,多数群体所具备的特质被视为是自然的和

普遍的。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差别被视为一种特殊性,而这种所谓的“特殊性”成为了定义少数群体的标准,而少数群体中的个体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殊性则经常被牵强附会地与它所在群体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正如吉约曼举例:“如果一个人是黑人,那么他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黑人:一个多数群体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具有其自身的特征,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徒。黑人的身份是被定义的,而多数群体的身份不是。”<sup>[6](P88)</sup>

多数群体身份(statut majoritaire)和少数群体身份(statut minoritaire)的对立和不平等既是实在的(concret),也是具有符号意义的(symbolique)。这种实在的不平等表现于少数群体在经济、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依附于多数群体,他们往往无法获得某些资源,不具备某些手段,这使得他们经常遭到统治群体的系统性剥削<sup>[7]</sup>。同时,这种不平等也是具有符号意义的,因为这种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社会在潜意识上接受这种不平等并逐渐习以为常。实在的不平等和象征的不平等相辅相成,实现并合理化了多数群体对权力的拥有以及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依附<sup>[6](P90)</sup>。

种族身份是这套社会符号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它使得大量毫无根据的刻板印象和毫不相干的联想成为可能,并在每个个体的潜意识中被合理化。在现实意义层面,某些种族的人因此在经济、法律和社会体系中遭受不平等的对待,例如,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少、更容易遭到盘查或侵害。虽然当今反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共识,但通过诉诸文化差别来更为隐晦地表达种族主义的观点,将不平等对待合理化的做法尤其值得警惕。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种族分类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文化或特征进行赞

扬也可能构成种族主义,并且依然值得警惕,因为在种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负面评价和正面评价往往是共轭双生的。文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一个族群的文化安全早已超越了文化本身的范畴。

### 三、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欧洲华人的处境:在赞扬和敌视之间

前文梳理了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运作机理,分析了这两种意识形态对世界上众多非西方民族和文明以及西方社会内部少数族裔群体构成的文化安全威胁。笔者结合欧洲华人社群的经验数据来考察这一群体现实文化安全处境,从而理解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如何对某一群体构成威胁的。

#### (一)欧洲华人的文化安全处境

欧洲华人社群,如同全世界所有的旅居他国的非西方移民社群一样,面临着一种双重少数的处境。首先,作为一个移民群体,欧洲华人社群在迁入国处于数量上、文化上、政治上等诸多方面的少数状态。这种现实意义上的少数和符号意义上的少数,加上他们的族群身份,使其极易成为种族主义的目标。其次,虽然欧洲华人社群人口构成非常多元,但他们的移民时间、移民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地位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等呈现差异化的特征。他们的个体主体性被剥夺,而他们的个体差异性又没能被关注,所以,欧洲多数群体常常会将他们与西方关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其中夹杂着大量的东方主义元素。如同其他的非西方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也居于少数群体地位(statut minoritaire),这使得出身于此文化背景的海外华人也被与东方主义形象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西方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同时又作为

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少数群体,欧洲华人社群处在一个双重少数的境地,其文化安全受到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双重威胁。

正如吉约曼对种族主义的剖析:“赞美或蔑视,钦佩或迫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sup>[6](P77)</sup>目前,欧洲华人社群处在来自本土社会的赞扬和敌视之间,最近出现的“模范少数族裔”(minorité modèle)<sup>[8](P12)</sup>和老生常谈的“黄祸论”(péril jaune)<sup>[9](P158)</sup>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刻板认知,其实都是居高临下地漠视少数群体主体性的体现,对文化安全在内的各方面安全都存在一定的威胁。

### 1. 模范少数族裔:一种居高临下的积极歧视

“模范少数族裔”的说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出现,用于称赞美国的亚裔族群相比于其他的少数族裔在教育、职业和经济上取得的较高成就<sup>[10]</sup>。相关数据显示,欧洲的华人大量从事餐饮、零售、进出口方面的商业活动,在法国,亚裔外来人口成为企业家的比例高于其他外来人口<sup>[11]</sup>,因此,“模范少数族裔”的概念也被用在包括华人在内的欧洲亚裔族群身上。欧洲的一些政治人物也会在一些公开场合赞扬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如法国总统萨科齐曾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称赞法国华人“在学校和工作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了共和国的价值观”。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在政治舆论总体对移民抱有敌意的背景下,这种赞美一方、贬低另一方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种族等级化(hiérarchisation raciale),并加深不同族裔之间的隔阂,将亚裔族群封闭在“每一个人都是成功的商人”的刻板印象中<sup>[8](P12)</sup>。事实上,在法国的华人群体中,成功企业家只是少数,大量的华人处在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并且只能在狭窄的族群劳动力市场(marché de travail ethnique)寻找工作<sup>[12]</sup>。

波多黎各裔美国社会学家 Bonilla-Silva 提出的“荣誉白人”(honorary white)概念揭示了宣扬“模范少数族裔”概念对社会的潜在威胁:通过在种族权利光谱上创造出一个中间群体,给予他们“成为白人”的希望,以此分化受害于种族主义的不同族裔,从而使白人处于社会结构顶端的同时,受到更少的争取种族平等的挑战<sup>[13]</sup>。给予包括华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其目的并不是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这种基于种族主义想象产生的赞誉只不过是“硬币”的另一面。一名法国居民的评论反映了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看法的两面性:

“我认为那些社会融入得比较好的人对中国移民的印象相对正面。可以说,这些人是很认真生活的,他们的孩子每天都去上学,他们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因此,对在这里没有太多问题的本地居民来说,中国移民是其中最积极的群体之一,相比之下,人们通常会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与犯罪、毒品等联系在一起。这些负面印象并不会用在中国人身上。相反地,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会强调这是一个封闭的、只愿意和自己人打交道的群体。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社区,外人很难与之接触,而且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些嫉妒,因为有些人(中国移民)虽然来这里时间不长,但已经成了商人。”<sup>[8](P144)</sup>

该访谈反映了一名居住在巴黎 Belleville 街区的当地居民对中国移民的看法,该街区为巴黎中国移民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同时也聚集了来自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移民。从上述访谈可以看出,虽然本地居民对不同族裔的移民已经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但是对于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裔移民群体的认知始终处于刻板的、笼统的层面,虽然将“认真生活”“孩子都会去上学”这些积极标签赋予中国移民,但是同时也会将“封闭”“只和自己人打交道”这些标签给

予他们,使他们区别于真正的法国居民。

在一项针对法国华人移民的采访中,很多受访者意识不到自己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或者否认自己受到了种族主义对待。一些华人移民会与非裔、阿拉伯裔等少数族裔群体保持距离,并认为种族歧视仅仅事关后者。一些在当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华人移民还会与其他少数化和边缘化的华人移民保持距离,并且认为后者受到的种族主义对待和自己并没有直接关联。同时,一些针对华人移民的种族主义言论并不直接面向这一“模范少数族裔”,而是通过对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批评或者偏见来间接表达<sup>[14]</sup>。

将华人移民乃至所有亚洲移民与“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相联系,使得共同遭受种族主义对待的少数移民群体被分化,反而使“模范少数族裔”遭到了其他被排斥的、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的嫉妒甚至敌视,从而使他们所处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 2. 黄祸论:基于东方主义想象的种族主义消极歧视

极具敌意的“黄祸论”是种族主义的另一面。关于“黄种人威胁”的论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在欧洲的舆论场。1905年,法国出版了一本题为《黄种人的侵略》(*L'invasion jaune*)的小说,描述了中日联合军队入侵白人文明的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sup>[15]</sup>。这本小说将当时西方人对东亚民族的东方主义种族偏见表现得淋漓尽致。推动这种种族主义偏见在欧洲舆论场上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欧洲工人阶级与中国劳工之间的矛盾<sup>[9](P158)</sup>。一方面,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导致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剥削愈发残酷,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于是,欧洲的工人群体经常发起罢工来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导致19世纪末的

中国积贫积弱,一些走投无路的底层中国人被迫远渡重洋到欧洲做劳工。这两类受到压迫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由此相遇,而早期双方一起劳动的地方大多是欧洲的远洋轮船公司。当欧洲的船员举行罢工抗议的时候,雇主会从其他地方以低廉的薪水雇佣中国船员,致使欧洲船员的罢工收效甚微。欧洲工人阶级对华人劳工的敌视由此产生,舆论场上的炒作使双方的隔阂进一步加剧,导致形成种族主义仇视。尽管如此,当时就有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者看出了资本家的压迫才是所有劳动者不幸的根源,煽动种族独立只不过是尝试掩饰资本家的压迫,“资本家不仅残酷剥削中国船员,而且利用他们破坏罢工运动,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sup>[19](P165)</sup>。

法国华人学者廖遇常通过对20世纪初法国媒体对中国移民的报道进行研究并指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关于中国移民的刻板印象在他们大量进入法国,并在此长期生活时就已经出现。雇佣童工、教父式的保护者、辛亥革命后逃到法国并且帮助其同乡也来到法国的富商、中国劳工对法国劳工就业的威胁、传播来自亚洲的疾病、“黄祸”威胁、封闭的社群、不知疲倦的工人等话题都是法国报纸常常提到的。这些关于中国移民的刻板印象很多都与17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末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紧密相关。19世纪末,中国贫弱、落后、混乱的整体国际形象催生了很多关于华人的偏见,他们被视为复杂、奇怪、神秘、虚伪、狡猾、不讲诚信的群体<sup>[16]</sup>。由此可见,移民个体在海外的文化形象与整个国家或者文明的文化形象密不可分。我们在讨论移民个体文化安全的时候,不可能对其来源国家的文化安全闭口不谈。

利用包括“黄祸论”在内的种族主义思想煽动针对华人或者中国的种族主义仇视,从而掩

盖真实问题的做法如今依然存在。在新冠疫情初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公然煽动公众对中国和華人的仇视与恐惧,从而掩饰其自身在执政过程中的各种问题<sup>[17]</sup>。加之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煽动,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焦虑情绪,以及潜伏在社会集体意识中的东方主义情结被点燃,最终演变成针对华人群体乃至整个亚裔群体的疏远、抵制甚至是侵害<sup>[18-19]</sup>。由此可见,作为被剥夺了主体性且任由外界定义的少数群体的欧洲华人社群的文化安全处境非常脆弱。一般情况下,华人群体被定义为“模范少数族裔”,用以分化弱势群体,缓和矛盾,而在遇到公共危机时,华人群体又被污名化,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因此,保障文化安全必须建立在拥有文化主权、拥有主体性的基础上,决不能被外界给予的标签式的赞誉迷惑。

## (二)文化安全的外延影响

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文化安全缺失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范畴,这再次证明从总体高度考虑安全问题的必要性。从欧洲华人社群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文化安全的影响已经外延到了经济安全(sécurité économique)、人身安全(sécurité personnelle)以及身份认同安全(sécurité identitaire)。

### 1. 经济安全

东方主义通过反复强调东方的落后性来确立西方的先进性<sup>[4](P7)</sup>。受这种观念影响很深的西方部分个体会将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事物与低端和高质量联系在一起<sup>[20]</sup>。新冠疫情开始在中国蔓延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将新冠病毒与中国人“粗糙”和“不卫生”的烹饪方式,以及“落后”的饮食习俗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潮导致欧洲大量中餐馆甚至亚洲餐馆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sup>[8](P210)</sup>。除了饮食文化被污名化造成中式餐饮行业的经济损失外,欧洲华人社群内

部的族群网络(réseaux ethniques)也遭到了污名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曾经位于巴黎Sedaine-Popincourt街区的中国商品批发区因为交通拥堵和噪声问题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抗议。这本来是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导致的问题,但时任该区区长Georges Sarre将此处的众多华人企业描述为“黑手党类型的系统”,致使当地华商与居民的对立越发紧张,此处的华商在此后的十年间逐渐搬离了该街区<sup>[21]</sup>。

巴黎的某些街区看似有大量亚裔人群聚集,因此被当成固有印象中的“唐人街”(Chinatown),但事实上,亚洲移民在巴黎的真实分布情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人们通常会将一些都市传说类型的想象与这些大众街区联系在一起,认为生活在这里的社群封闭且自成一体。新冠疫情初期,这些大众街区遭受到了污名化,法国公共部门用区别对待的方式介入和管理这些街区,某些措施显得粗鲁甚至暴力。相比于社会精英,国家更加不信任这些大众群体<sup>[22]</sup>。

从以上论述我们发现,这些符号意义上的不平等和实在意义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种族主义对待不仅威胁着移民群体的文化安全,也威胁了其经济安全。由此说明,文化层面上主体性的缺失也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 2. 人身安全

相比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问题造成的人身安全威胁是每一个生活在欧洲的华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不论是较早的东方主义臆想,还是近几十年以“模范少数族裔”为代表的“正向”种族主义偏见,都一直将华人群体塑造成内敛温顺、勤劳富裕的形象,这恰恰使得该群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侵害的首选对象。2016年,在法国华人社群引起轩然大波的“张朝林遇害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朝林是一位在巴黎北郊Aubervilliers市工作的中国裁缝,他和一位朋友

遭到了三个歹徒的抢劫,且被殴打致死。在审讯时被问到为什么要选择张朝林等华人下手,犯罪嫌疑人的回答是——听说中国人很有钱。这引起了当地华人的极大愤慨和抗议<sup>[23]</sup>。事实上,安全问题已经是当地华人,尤其是在一些治安不好的街区经商的华人最担忧的问题。2009年,汇集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华人受访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示遭受过至少两种形式的暴力,包括语言侮辱、盗窃或者抢劫、当地警察或者公职人员的语言暴力等,56%的案例发生在巴黎,23%的案例发生在巴黎北部郊区的Seine-Saint-Denis地区<sup>[8](P148)</sup>。

在2016年张朝林遇害事件之前,法国华人就已经组织开展了一些抗议治安状况恶化的游行示威,但是这次事件让法国华人社群和法国社会深刻意识到“正向”种族主义危害的严重性。主体性缺失导致华人群体的文化形象交由外界定义,而外界定义的随意性和片面性最终将华人群体的人身安全放在了一个极其脆弱的位置。

### 3. 身份认同安全

文化安全方面的问题造成的现实意义上和符号意义上的威胁还会影响到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安全,这种身份认同安全在法国出生或者成长的二代华人身上尤其明显。长久以来的东方主义臆想给“中国人”这个身份贴上了太多标签,而种族主义内涵的分类逻辑又会自发地将这些标签给予那些外表与多数人不同的华人移民的后代,他们基于想要融入社会、获得认同的急切心理,会对这些标签尤其是其中的负面标签产生极大抗拒,当他们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拒绝不了这些标签时,就会选择尝试与自己的“原生身份”进行切割,并努力接受新的身份。这时,他们常常处于“身份拉扯”之中,他们会问自己:“我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当他们自以

为切割了自己的“原生身份”后,又发现那些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标签依然会强加给自己,由此,他们可能会对获得的新身份感到失望。因为一个稳定的身份必须是外界和自我的同时认同,最后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身份真空”,即“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当地人对华人移民的区别对待并不会随着新一代移民对本地语言的掌握和文化的认同而消失,以下华裔青年的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觉得我总是必须对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发表看法。因为我看起来像‘中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所以我必须发表意见。比如,我的法国朋友总是对我说:‘你们中国人……’那时我就明白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但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没有中国文化背景,我中文说得也不够好。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与朋友的相处更像法国人。但是,在法国人面前,他们总是会对我说‘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sup>[8](P132)</sup>

这种青少年华人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不仅会对整个群体的身份认同安全造成威胁,还可能让他们自身处在极大痛苦之中。为了保护中华文明的文化安全,保护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安全,要从根本上杜绝滋生出这些标签的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让这些移民的后代可以毫无顾忌地接受自己的“原生身份”,并由此构建自己多元身份认同。这对移民后代的健康成长、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甚至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

## 四、改善文化安全形势的努力和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华人群体在保证自身文化安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具体形式包括中文教学、文艺演出、节日庆典等。进入21世纪后,法国已经成为欧洲中文

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100多个协会和机构提供中文教育服务,其中,绝大多数中文学校是由华人社团兴办的,华裔学生超过2万人<sup>[24]</sup>。法国还有很多华人艺术协会,他们在各种场合举办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艺演出,其中一些活动还受到了法国当地政府和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支持<sup>[25-26]</sup>。每年春节的时候,一些华人相对较多的街区都会张灯结彩,并举办舞龙舞狮等庆祝活动<sup>[27]</sup>。法国的华人社团在巴黎市区兴建了一些礼堂和佛教寺庙,方便当地中国移民进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教活动<sup>[28]</sup>。

虽然法国华人社团和企业在华人社群内部和当地社会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带来的文化偏见,对保护自身的文化安全有着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这些文化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由于这些文化活动大多由当地华人社团、企业发起和资助,其活动经费和规模有限,很多文化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仅限于当地的华侨华人。二是这些文化活动的组织缺少规范性,以法国的中文学校为例,很多中文学校只是课余补习性质的教学机构,其课程设置、学生的考核标准、教师的筛选、教学行政体系等还有待标准化。一些学生只是迫于父母的压力才来学习中文,其自身积极性并不高<sup>[24]</sup>。三是华人移民的一些文化活动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是更多的是被公众视为一种异域风情的展现,其中深层次的文化、思想或者宗教内涵很少被理解。这些现实中被观察到但却没被理解到的真实存在的文化现象常遭到曲解甚至污名化,为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提供了“灵感”。因此,保护华人移民群体的文化安全依然任重道远,而改善文化安全处境的努力不能离开对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运作机理的解构。

## 五、结语: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理解个人文化安全

前文结合欧洲华人社群的案例,展示了一个少数群体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处境,以及这种文化安全层面的威胁如何延伸到经济安全、人身安全、身份认同安全等领域。海外华人的个人文化安全与祖国文化安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共同受到东方主义、种族主义等“他者”化、区别化观念的冲击。那么,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海外华人虽然远离祖国,但是相同的“根”使得华人始终保持着对祖国朴素又真切的文化认同,移民网络的存在使得来自祖国的文化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海外移民社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让海外华人可以接收到和国内人民一样的文化熏陶。这种文化认同与熏陶从内部使海外华人的个人文化安全与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结合成了一个整体。同时,种族主义对少数族裔的区别化,以及东方主义对非西方文明的“他者”化,使得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和海外华人的个人文化安全面临着类似的威胁,从而从外部将两者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东方主义通过创造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剥夺其话语权和历史性,并将臆想出来的各种形象强加给对方,完成了对其他国家文化安全的渗透,从而将帝国主义对东方文明的支配合理化。虽然现在已是后殖民主义时代,世界大多数民族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在国家政治层面的殖民统治,但是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去殖民化依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确保文化主权、保护文化安全是后殖民主义时代捍卫总体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东方主义臆想出来的形象给西方社会内部的种族主义者提供了“灵感”,他们

有充足的理由强调自己与社会中某些人群的不同,并完成对少数和多数的分类,从而将自己的歧视性思想、言论和行动合理化。种族主义偏见深深地威胁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安全,并进一步威胁着其经济、政治、人身、身份认同等各方面安全。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相互呼应,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冲击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安全及其海外移民个体的文化安全。

因此,要保护海外华人的文化安全,一方面,需要呼吁所在国家和社会秉持反种族主义原则,只有对一切正向或负向的种族主义偏见保持警惕,停止使用定义性的语言描述少数族裔群体,尊重其主体性,确保其文化自主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因为文化安全缺失所导致的各种安全威胁。同时,海外华人群体也应在当地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努力抗争,积极为个体文化安全发声、为祖国文化安全发声。另一方面,要坚定“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两个领域解构东方主义叙事,进一步强化文化自主权,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让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载体。只有在国家自身的文化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海外华人的文化安全才能得到保护。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认识到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对中国和海外华人造成的文化安全威胁并不是特例,类似的机理也适用于其他的移民群体。解构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运作机制对消除由此产生的不合理行为,保护不同民族和不同族裔个人的文化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以及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开展正常生产生活至关重要。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依存,并在交流中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保护文化安全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是坚定文化自

信,在开放环境中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展示、诠释和传播自己的文化,用创新的方式使文化安全受到全方位的保护。

### [参考文献]

- [1] Watanabe Y. Handbook of cultural security[M].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8.
- [2] 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5-14.
- [3] Said E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Knopf, 1993.
- [4] Said E W.Orientalism[M].London:Penguin Classics,1972.
- [5] Marx K.Lettre de Karl Marx à Pavel Vasilyevich Annenkov [EB/OL].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francais/marx/works/1846/12/kmfe18461228.htm>.
- [6] Guillaumin C.L'idéologie raciste genèse et langage actuel [M].La Haye:Mouton,1972.
- [7] Guillaumin C. Sur la notion de minorité[M]. Memmi A. L'Homme et la société,Paris:L'Harmattan,1985:101-109.
- [8] Chuang Y H. Une minorité modèle?: chinois de France et racisme anti-asiatiques[M].Paris:La Découverte,2021.
- [9]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 [10] Zhou M, Lee J. Hyper-selectivity and the remaking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Asian American achievement paradox[J].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7,08 (01):7-15.
- [11] Ma Mung E. L'entrepreneuriat ethnique en France[J]. Sociologie Du Travail,1994,36(02):185-209.
- [12] Ma Mung E. Le prolétaire, le commerçant et la diaspora[J].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2009, 25(01):97-118.
- [13] Bonilla-Silva E. From bi-racial to tri-racial: towards a new system of ra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SA[J].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4,27(06):931-950.
- [14] Wang S, Madrisotti F, Li Y, et al. Déni et (d)énonciation du racisme anti-asiatique au temps d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J].Émulations:Revue Des Jeunes Chercheuses et Chercheur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22, Race, Racismes, Racialisations: Enjeux Conceptuels et Méthodologiques,

- Perspectives Critiques(42):129-146.
- [15] Live Y S. Chinois de France: un siècle de présence de 1900 à nos jours[M]. Paris: Ed. Mémoire Collective, 1994: 22.
- [16] Live Y S. Les Chinois en France à travers la presse: un aperçu sur cent ans de stéréotypes[J]. Migrations Société, 2021, N° 183(01): 29-45.
- [17] Davis C R. Trum "pseemingly legitimizing" the rise in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ccording to a UN report [EB/OL]. Business Insider,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n-report-trump-seemingly-legitimizing-hate-crimes-against-asian-americans-2020-10>.
- [18] Haus H, Revenu N. Coronavirus: le racisme antichinois jusque dans les cours de récré[EB/OL]. Le Parisien, <https://www.leparisien.fr/societe/coronavirus-le-racisme-antichinois-jusque-dans-les-cours-de-recre-31-01-2020-8249106.php>.
- [19] Helies K. En France, la pandémie de Covid-19 a mis en lumière un «racisme anti-asiatique ambiant» [EB/OL]. Le Parisien, <https://www.leparisien.fr/societe/covid-19-une-pandemie-revelatrice-dun-racisme-anti-asiatique-ambiant-08-07-2021-3KK7W5DRO5GW3NO354HE2NECEI.php>.
- [20] Chan C, Montt Strabucchi M. Many-faced orientalism: racism and xenophobia in a time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in Chile[J]. Asian Ethnicity, 2021, 22(02): 374-394.
- [21] Chuang Y H. Émergence et régression d'une enclave urbaine: les grossistes chinois dans l'Est Parisien[J]. Migrations Société, 2013, N° 149(05): 191-208.
- [22] Talamon F. Migrants, quartiers populaires, les boucs émissaires du Covid-19? [J]. Hommes & Migrations, 2023 (1343): 184-188.
- [23] Leplongeon M. Aubervilliers: ce que les agresseurs de Chaolin Zhang ont dit à la police [EB/OL]. Le Point, [https://www.lepoint.fr/societe/meurtre-d-aubervilliers-ce-que-les-agresseurs-ont-dit-a-la-police-02-09-2016-2065408\\_23.php](https://www.lepoint.fr/societe/meurtre-d-aubervilliers-ce-que-les-agresseurs-ont-dit-a-la-police-02-09-2016-2065408_23.php).
- [24] 王琳. 法国华文教育的新发展及其困境: 以法国新兴华文学校为例[J]. 世界华文教学, 2020(1): 83-100.
- [25] 吴文超. 法国华人华侨梦之声艺术团受邀法国93省BOBIGNY市大型《中国秀》晚会 [EB/OL]. 华人街网, <https://www.huarenjie.com/thread-8397959-1-1.html>.
- [26] 高朋满座 群贤毕至 共庆中法建交60周年 旅法侨界举办大型文艺晚会 [EB/OL]. 欧洲时报, <https://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wechat/eastwest/2024-01-17/1197486350212825089.html>.
- [27] 孔帆. 疫情三年后重磅回归 巴黎十三区春节彩妆游行登场 [EB/OL]. 欧洲时报, <https://www.oushinet.com/static/content/qj/qjnews/2023-01-29/1069485187719258112.html>.
- [28] Pan J L. Invisibilité des pratiques religieuses des migrants chinois en France [J]. Migrations Société, 2021, N° 183(01): 111-126.